

陈必娣：钢铁玫瑰

文/李蔚峰



陈必娣手里拿着当年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

美国老专家陈必娣（Betty Chandler）辞世将近10年了。今年清明节，按照我与她5个子女的约定，我又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她扫墓，表达我的哀思，同时给她带去远在美国的孩子们对她的思念！看着她的遗像照片，她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微笑着目视前方，这笑容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这笑容里可以说包含了她对中国人民的热爱。

陈必娣生前在北京友谊宾馆东南区（现称雅园公寓）居住和生活了20多年，我的办公室和她的房间距离很近，因此与她的接触很多。我很想把我的记忆碎片编织成一只花环敬献到她的遗像前，把她微笑背后的故事写出来与更多人分享，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位自己不愿出名的美国老专家。

风雨中国路

陈必娣1915年5月6日出生在加拿大靠近美国边境的温雷帕克市。1922年随父亲回到美国西部俄勒冈州的故乡，并在那里顺利读完小学和中学。1934年进入俄勒冈州立大学攻读营养学专业。1936年9月她以中美交换学生的身份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怀着对伟大而又神秘的异国的向往，她离开亲人，来到广东的岭南大学留学。

一年的留学生活，使她初步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朦朦胧胧产生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心。她曾说：“看到那些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哪怕是有一丝人情的普通人都会不会熟视无睹，都会下意识地给予一定的怜悯和同情。”有一次，她遇到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将

脏兮兮的小手伸到了她的口袋中扒窃。口袋很紧，小男孩抽不出手，她也因此发现了。然而，她和那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小男孩谁也没有说什么，就各自走了。

这件事她却始终无法忘怀。这样饥寒交迫的孩子中国不知还有多少！1937年7月，陈必娣和她的大学同学结伴到上海、北平（今北京）观光旅游。在北平，她亲眼目睹了中国伤员和无辜的街头小贩被炸伤后无人护理的惨景，这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于是，她勇敢地走出美国政府为保护本国侨民而设立的兵营，投身到外国团体组织的卷纱布、缠绷带等护理工作中，有时她还亲自把缠好的绷带送到中国医院，帮助护理伤员。

1937年8月陈必娣独自离开北平，取道天津，经日本，返回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继续学习。次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俄勒冈州立大学的文凭。而后，她先后到密执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从事营养学专业实习，时隔12个月，正式留在该院工作。就在这座医院里，她结识了正在医院胸外科学习的中国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张纪正。共同的医学志趣，还有她在中国学习期间对中国人产生的好感，使他们俩很快就坠入爱河相爱，并最终结成伴侣。1941年她来到中国，与张纪正在北京结婚，后随张纪正在天津安家。1942年他俩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从这时到上世纪50年代初，她除了抽空为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写文章外，一直在家里操持家务。后任上海《中国周刊》记者。抗美援朝期间，她把全部的积蓄都捐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60年代初，陈必娣来到北京，在外文出版社任英文专家。她对自己这份新工作十分珍惜，每天没日没夜地工作。她主要的工作是撰写英文稿件，同时兼做英文校对。这项工作需要使用英文打字机，那时候使用的是带色带的键盘打字机，每个字母都需要手指用力地敲打出来。在后来和她的接触中，我发现她的中指变形了，当时我就好奇地问她原因，她伸出那个手指让我看了看，说道：“那都是因为那时候我天天打字所造成的。”即使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她还是捐献了1000元人民币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援朝。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必娣十分迷茫。当她看到昨天还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今天却扫起了楼道和厕所；昔日里还是并肩工作的同事，今日却分成了两派相互斗争；曾经的先进工作者，如今却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这都是为什么？那时候也有造反派怂恿她要主动揭发某人，或者和某人划清界限，可是她刚直善良的性格不允许她那样做，她也不忍心那样去做。有一次，她看到一

张大字报是为了一位她十分熟知的而且非常优秀的领导鸣不平的时候，她不顾后果在底下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表示赞同。第二天她再次看到那张大字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箭头指向了她的名字，箭头旁写着“你算老几？”甚至在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在她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她突然被一个铁丝做成的羁绊绊倒摔倒在地，并将自己的股骨头摔坏。在以后我和她的交谈中，每当提起这件事她都会用英文说道“人为的陷阱”（That is a man-made trap）！可是她并没有退缩。她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棍子可以打折我的骨头，但是打不折我的灵魂！”（A stick can break my bone but not my soul!）

她的倔强

1984年陈必娣从外文局专家楼搬到北京友谊宾馆东南区（现称雅园公寓）居住，我和她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对她刚直性格的感受也越来越深。2002年的春节前，按照惯例，国管局领导会在宾馆领导的陪同下看望住馆的外国老专家们。当天要看望的外国老专家有好几户，我事先进行了时间安排，并告知每一位外国老专家被看望的时间。那天我告诉陈必娣领导会在上午10点钟到家中看望她。那天在看望陈必娣之前，国管局的领导突然提出要去看看宾馆正在兴建中的一个项目的进展情况。等看完那里的情况后来到陈必娣家时，比约定的看望时间晚了近10分钟。当我陪同那位国管局领导和宾馆领导来到她家时，我看到她站在门口挡住了我们进入房间的路，不让我们进去。她抬起手臂，用手指着她腕上的手表，意思是我们迟到了，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来。国管局的那位领导很尴尬，于是也向她表示歉意，可她依然站在那里不动，丝毫没有让我们进屋的意思。看到此种情况我急得满头大汗，只好向她讲明情况，并再三表示歉意。她这才挪开了身体让我们进入了她的房间。这件事让我透彻地领教到了她的倔劲儿。

2004年随着我国政府放开了对外国人的居住限制，大部分住馆的外国专家也相继搬出了宾馆。陈必娣所居住的雅园公寓也由原来以外国专家居住为主，变为以公司办公为主的局面。这种商住两用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公司的客人大都经商，来来往往的货车就会进入雅园公寓，给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专家们（特别是带孩子的外国专家）带来了嘈杂的环境和不安全的因素。外国专家们都很有意见，纷纷向宾馆领导进行投诉，希望不要让车辆进入雅园公寓。作为执行部门，我们也感到很为难，因此我在和她谈及此事

时，总是会对她说“对此我们没办法”。而她听到我这样说之后总会跟上一句“有办法！”果然有一天我和她正在院内散步，看到一辆宝马车迎面驶了过来。我正在犹豫如何去劝阻该车司机时，她却拄着手杖加快了脚步迎着那辆宝马车走了过去。那位司机看到一位银发外国老人迎着他的车走了过来，被吓住了，急忙踩刹车停了下来。而陈必娣却没有停止她的行动，她举着手中的拐杖向司机挥着，示意他把车倒出去。该司机虽然犹豫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被她的这个架势给镇住了，将车倒了出去。见到此情此景的我，一方面为她的举动感到担心，而更多的是对她的这种勇敢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看着倒出去的汽车，她扭回头对我说：“你看你总是说没办法，而我说有办法，瞧，这就是我的办法！”她的这个举动后来在馆内广为流传，从那以后那些公司的车辆都不会随意地进入雅园公寓，因为那些公司的人都对这位满头银发的美国老太太产生了敬畏感。

热爱生活

陈必娣作为一位受过革命思想影响的美国女性，她的性格中显现出刚强执拗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性，她的身上也尽显柔美的天性。她热爱生活，对大自然情有独钟。而春天花儿刚刚开放，她会在散步的时候拿着照相机，把沐浴春风的迎春花、含苞怒放的玉兰花、争奇斗艳的桃花、仪态娇媚的海棠花等一一拍下来，回家后精心挑选出几张她认为拍得不错的，让我拿到图片社洗印出来，摆在她的桌子上面欣赏。冬天的雪景更是她喜欢的景致，覆盖在屋顶上的雪、铺满草坪上的雪、挂在松树上的雪、依偎在假山石上的雪都被

她一一捕捉进她的镜头里。同时她也非常注意自身的形象，总愿意将自己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众人。有一年夏天，我陪同她到北戴河休假，那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加上股骨头曾经做过手术，走路时需要拄拐棍。一次在海边几个俄罗斯孩子请求和她合影，当我调了调焦距正准备按快门儿的时候，她突然冲我喊道：“等一下！”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停了下来。这时我看到她将拄着的拐棍慢慢放到了自己的身后，用手梳理了一下被海风吹乱了的头发，然后才摆出了她带着微笑的姿势，让我拍照。

陈必娣热爱生活、乐于助人，尤其喜欢孩子。她自己生育了三男两女五个孩子，改革开放之时都定居去了美国。丈夫去世后，特别是从工作岗位退休以后，她不免感到孤独寂寞。于是选择了免费向儿童教授英语来发挥余热、证明自己的价值。在教授英语的过程中，她十分耐心，一点也不马虎，经常是提前备课。有一次我对她说：“您都是专家了，教小孩英语还用备课吗？”她却认真地回答道：“我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了。特别是英语的发展很快，新的词汇很多，我有点跟不上了，所以需要提前准备。”

陈必娣带着对生活深深的眷恋离开了我们。但她一定希望我们的生活会继续下去，生活得更好。我记得她曾经对我说过，在当年朱镕基总理与外国老专家们座谈后与每位外国老专家合影留念时，她握住总理的手深情地对他说：“继续向前！”（Keep going!）她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继续向前，经济越来越发展，国力越来越强大；她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继续向前，生活得越来越美好；她希望世界能够继续向前，走各国和平发展之路。我想她的这些希望也是我们共同的希望。安息吧，Betty! 我们会努力地继续向前，来年我还会再来看你! ■



陈必娣（左一）在家包饺子